

提升春运服务水平无止境

2020年春运将于1月10日正式启动。北京西站1月5日发布春运运输方案及多项服务措施,包括旅客进站流程改为先安检后验证验票,部分列车实行东西两侧候车室双向放行,所有到达车次增加出站口位置等。据测算,仅“先安检后验证验票”一项措施即可有效缩短旅客进站时间50%,为今年春运便利畅通提供有力保障。

近年来,铁路逐步全面实行进站实名验证验票制度,在保障旅客购票安全、出行安全等方面迈上一个新台阶。按照惯例,国内大部分车站都实行先验证验票再安检的进站流程,车站内安全秩序显著提升,不过在春运等特别紧张繁忙时期,先验证验票再安检的方式会让旅客在站外落客区大量滞留。为缓解客流交叉混杂的现象,北京西站

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进站流程,改为先安检后验证验票的方式,利用站内空间缓解客流压力,让旅客缩短站外排队等候时间快速进站。一个流程的改变,极大方便旅客进站乘车,使出行体验得到提升。

“先安检后验证验票”的举措,并非北京西站首次实施。根据实际客流需求,春运、暑运等特殊时期一般都会临时调整旅客进站流程,最大程度缓解客流压力,方便旅客安全畅通出行。这个“先后对调”的进站流程看似简单,背后体现了车站工作人员既要维持站内常态安全秩序,又要解决超大客流拥堵问题的周到考量。一年之中,按需施策,灵活调整进站流程越来越得心应手,北京西站服务管理水平显著提高。

当然,进站流程改变仅是铁路部门“以

小见大”提升服务管理水平的一个侧面。今年春运期间,北京西站还将改造南北进站口,增设安检仪;增加出站口,缩短出站通道,方便换乘出租、地铁;部分列车实行东西两侧候车室双向放行,缩短上车通道距离;增设站内换乘流线引导标识,方便中转旅客站内换乘等。值得一提的是,城市副中心线进站流程也得到显著优化——进站口调整至地下出站口的位置,方便乘坐地铁到达西站的旅客进行平层换乘,有效减少旅客换乘周折。

今年春运是电子客票试点第一年,北京西站的售票、验证验票、检票等设备已全面更新升级。春运期间,在进站口、售票厅等重点地方,新增加的志愿者将现场帮助旅客了解电子客票使用方法,提高效率,迅速

通过进站。另外,互联网取票业务还开设快速取票专口,并根据客流情况调整专口数量。

春运是全国铁路客运一年一度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考验,为确保春运安全顺利实施,每年铁路部门都要精心组织、科学筹划,推出一些优化管理、提升服务的新举措、新方法。各地铁路部门和交通、公安等部门密切协作,在购票、乘车、餐饮、疏散等关键服务环节深度挖潜,努力探索创新,一边强化智能化服务管理创新,一边以旅客所需为中心,大力改善乘车环境,提升出行体验。从临时性设置、动态性调整到常态化制度建设,从每一个细微的改进,到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都给旅客出行带来实际的便利和关照。(金雨虹)

别任由“对公账户买卖”成为网络诈骗帮凶



最近,有媒体记者调查发现,“对公账户”竟然也成了可以随意交易的商品,而这些交易已成为支撑电信网络诈骗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在网络上,有大量打着“对公账户买卖”旗号进行违规交易的个人及网站,售价最低6000元一套。

所谓“公账户‘套装’”,包括对公银行卡、相关公司的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照片、对应网银U盾、银行预留手机卡等。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相比于个人账户,对公账户的欺骗性更强,所以也更受一些不法分子的推崇。

针对账户贩卖等现象,前不久,央行、公安部就联合下发通知,不仅提出要惩戒贩卖个人银行卡和企业对公账户的行为,还首次提及,将把涉事个人信息移送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即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对公账户买卖一旦被查处,后果不仅仅是5年内不得再办理对公账户,还要被列入征信系统,留下诚信污点,这对买卖双方显然都是警示。

正视外卖小哥的权益诉求

外卖骑手是伴随着网络订餐等新业态而日益壮大的社会群体。在通行的“计件”模式下,骑手们可谓“风里来雨里去”,其辛苦众所周知。可恰恰是脱胎于互联网新业态,使得平台、商家、用户各方在与外卖骑手打交道时,都强化了服务的时效等要求。对很多用户来说,通过网络平台订餐,很多时候就是出于“方便”的考虑,倘若骑手不能如期送达,自然就会感到“不方便”。正因为如此,面对行业的激烈竞争,平台就得抓住时效这一关键,千方百计用体现时效的方式来考核骑手。

渴望注册成立行业协会,折射了现有模式下外卖小哥对保障正当权益的诉求。换一个视角,更好地保障外卖小哥正当权益,实际上也是在保障用户和消费者的权益。在刚性的考核机制下,看似保障用户和消费者权益的投诉反馈机制,反倒有可能加剧外卖骑手与服务对象的冲突,以致酿成惨剧。行业协会的存在,可以给外卖小哥更多集体话语

值得一说的是,2019年7月22日,央行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消企业银行账户许可,以往企业开立基本存款账户和临时存款账户,需要经过商业银行审核和人民银行许可两个环节。取消许可后,商业银行对企业开户申请审核无误后,即可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开户。

这合乎简政放权的要求,但“放得开”更要“管得住”。一方面,要在办事程序上,尽可能地为企业减轻负担,缩短审核时间;另一方面,不能一放了之,后续的审核和监管不能放松。说白了,从管理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无非是尽量让企业轻松一些,让公共服务部门多承担一些。所以,提高违法成本的确很有必要,堵住对公账户买卖可钻的空子,也不可或缺。

记者在调查中就发现,很多涉案的对公账户,对应的公司是空壳公司,有的登记住址不存在,有的除了作为资金转移通道外没有任何其他交易往来。对于这些空壳公司,就该多些日常巡查的工作,严厉打击买卖企业对公账户违法犯罪活动。(华闻)

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个体对平台表达权益诉求时的相对弱势地位。不过,从之前的一些案例中“亡羊补牢”,应该清晰认识到,在改变某些不合理的考核机制上,平台有足够空间去主动作为,由此也能让平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具竞争力。

进一步,保障外卖小哥的正当权益诉求,还体现着发展互联网新业态的必然要求。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日前发布的拟新增职业信息公告显示,即将公布的16个新增职业中即可以看到外卖小哥的身影,只不过其正式职业名称是“网约配送员”。按照其定义,该职业不仅包括送餐的外卖小哥,也包含了所有通过网络平台接单,按照平台智能规划的路线,在一定时间内将订单的物品递送至指定地点的服务人员。透过该定义,平台以什么样的机制匹配服务的供需双方,以及以什么样的考核方式既激励服务的提供者,又能不断增进服务质量、让服务对象满意,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子长)

反腐红线面前 从来没有“功过相抵”

过去的一年,纪检监察机关始终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取得了备受好评的反腐败硬核成绩单。相比某些为祸一方的腐败分子终于被打掉,人们无不拍手叫好,有些曾经在工作中取得佳绩,甚至赢得崇高荣誉的干部,也因贪腐落马,则让人倍感惋惜。时间,没能将他们的荣誉擦得更加光亮;荣誉,反而让他们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曾经都在各自岗位上干出了出色业绩,得到了群众认可,是领导干部中的标杆。然而,迄今为止已有5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落马,除了张尚华,还有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原厅长冯振东,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原局长董金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委原常委、西吉县委原书记马志宏,山东省泰安市原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永征。

人性是复杂的,也是脆弱的,对干部的考

察依据,只能是他过去的表现,而人可能是会变的。某些“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腐化变质提醒我们:不能低估腐败问题的顽固性和复杂性,不能指望反腐败毕其功于一役,不能搞“差不多主义”,不能见好就收。

那些过去的好同志,变成如今落马的贪官,对更多官员,则是一种有力的警醒:在反腐红线面前,没有“功过相抵”这一说。如果将功劳簿视作“保险箱”,将曾经的荣誉视作腐败的资本,以为有过政绩有过功劳,就可以遮住各种错误,那他已经开始步入危险的深渊,走向了不归之路。

事实上,再坏的贪官,或多或少也会做过一些好事。反腐败如果以功论罪,客观上将会使得官员政绩成为免罪资本,甚至鼓励那些做出成绩的官员都去贪腐,那样的后果,既可怕也荒谬。所以,不要指望回到封建社会“八议”“官当”等传统,法治社会绝不宽容“功过相抵”。(木子)

喜羊羊成通行暗号 执法人员别玩“职权变脸”

近期,根据群众在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的货车司机靠买“路牌”通行、不法人员收取保护费问题线索,国办督查室派员赴广东省揭阳市普宁市和惠来县进行了实地暗访督查。督查发现,当地买卖“路牌”收取保护费现象普遍,已成公开的秘密。这些路牌被标记成“飞马”“机器猫”“喜羊羊”等符号,作为执法人员与司机的接头暗号。

一张“路牌”市价一般是1个月1800元,钱直接交给“黄牛”就可以超载通行,实在令人咋舌。既然货车“路牌”的生意这么好,当地治超怎么可能治好?

这样的“行规”不可能仅靠几个“黄牛”就能定下来,也不可能短时间成为货运行业一体遵守的“规则”。当地货运“路牌”生意发展得如此“成熟”,背后必然有一条灰色乃至黑色的利益链条。

可以说,在这条灰色利益链条中,监管部门仍处于主导地位。这也意味着,正是因为监管部门的失灵、失守,乃至直接投身利用权力牟利的泥潭,才导致当地货运行业整体性沦陷。

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路牌”,“飞马”“机器猫”“喜羊羊”“苹果”“莲花”“安顺”“货运”“险”等等,其实就是职权滥用的“变脸”。为什么贴着“路牌”的满载“百吨王”来来往往,甚至从执法车旁经过,执法人员都视若无睹?根源就在于此。

当下的要务,首先是净化当地的政治生态,彻底清除监管部门中的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对违法包庇纵容、知法犯法的行为,必须严肃追责,严厉查处,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其次,也要谋求产业转型升级,不能听任“百吨王”大货车继续上路了。(龙之朱)

学生扫雪险截肢 保护教育为何缺课

2019年12月31日,黑龙江安达一名13岁初一女生在校内扫雪时没戴手套,手被冻成重伤,险截肢。医生介绍,女孩刚来医院时手已经冻成青黑色,经过治疗,目前冻伤的面积慢慢变小,手指颜色也在逐渐恢复中。

黑龙江的严冬里,室外活动双手长时间暴露,冻伤风险极大。医生说,“女孩在外面已经受伤大概6个小时左右”;这6个小时还可能包括了冻伤后去医院花在路上以及转院的时间,但扫雪的时间若不是很长,应该不会至于冻成重伤吧。而这期间,老师、学校管理者有没有关注学生安全防护的问题?

一些网友说,学校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动力了。这种说法略为偏颇,清雪之类的校内劳动也是一种锻炼,只要防护得当、合理安排即可。但是,因扫雪冻伤,即便是个案也不

允许发生。学生冻伤,首先要追责学校、老师负有的教育和保护责任。如果组织清雪之前先给学生们上一堂保护课,要求必须穿戴、戴帽戴手套,并检查学生们的衣着是否足够适应室外天气后再去扫雪,扫雪过程中,时时关注每个学生的情况,那么,冻伤的情况还会发生吗?

教育中夹杂的某些功利化、实用价值观问题,在中小学领域虽不能说带有普遍性,但也绝不是一个小问题。“扫雪冻伤手险被截肢”这件事最让人难过的,不只是一个孩子的伤痛,还有教育者在学生利益以及自身责任问题上的麻木。须知,书本教育和基本安全防护教育,都是教育的基本内容。在某些教育者那里,什么时候才能让它们之间不存在厚此薄彼的关系。(马涤明)